

旧版文章

天人古今

- 古今通论
- 古代通论
- 世界史论
- 当代三农
- 现实问题
- 旁通类鉴

先秦史论

- 先秦通论
- 原始经济
- 文明起源
- 夏商西周
- 春秋战国

汉唐史论

- 汉唐通论
- 战国秦汉
- 秦国秦代
- 西汉东汉
- 魏晋南北朝
- 隋唐五代

宋元史论

- 宋元通论
- 唐宋通论
- 北宋南宋
- 辽金西夏
- 蒙元史论

明清史论

- 明清通论
- 明代通论
- 明中后期
- 清代通论
- 清代前期

近代史论

- 近代通论
- 清代晚期
- 民国通论
- 民国初年
- 国民政府
- 红色区域

现代史论

- 近世通论
- 现代通论
- 前十七年
- 文革时期
- 改革开放

学科春秋

- 学科发展
- 专题述评
- 年度述评
- 学人学术
- 学者小档

理论方法

- 史观史法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他山之石 / 美国史坛 / 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全新解读

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全新解读

2006-04-15 傅小凡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点击: 1731

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全新解读

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与阶级关系的全新解读

傅小凡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361005)

《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建国初期到“文化革命”结束之前，特定的价值取向曾经使对中国农村经济史问题的研究成为史学、经济学理论的热点之一。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的目光纷纷离开农村，农村经济问题被空前地冷落。时至今日，“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但是历史学界并未因此恢复对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然而，国外学者并不受国内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依然在他们的视野之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白凯(Kathryn Bennhandt)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厦门大学林枫博士翻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9月)一书的出版便是明证。

白凯教授对于近现代长江下游地区农村经济及农村问题研究的兴趣，当然是起因于对“中国共产革命”的探索。她对研究“中国共产革命”起因问题的三种方法作了分析，这三种方法包括：一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将革命归因于在商业化和帝国主义的冲击下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结果使地主和佃户之间的阶级冲突升级，“共产革命”是农村阶级冲突激化不可避免的结果。二是道义经济的研究方法，强调在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民生活日益不稳定，农耕社会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并轨，以及国家干预的扩张，都严重威胁着农民在勉强糊口的水平上维持自身生存的能力。三是市场经济的研究方法，主张商业化和与世界经济的并轨显然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计，并从而提高了农村生活水准，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变革才能治愈的任何深层的结构弊病，而是因为一个或更多的直接政治因素的影响。白凯认为，上述每一种视角都有助于解释她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单独运用任何一种方法都无法解释19—20世纪江南事态的发展。

白凯的方法的确有别于前人，因此决定了这部著作无论在逻辑结构还是内容展开方面，都显得新颖别致。她将国家政权、精英(地主阶级)和佃户作为自己论述的主要对象，这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三方各自地位的变化则是本书论述的主题。从静态的角度看这三者的关系，大致可如此描述：对佃户来说，为生存而争取尽可能多地保留劳动成果；对地主而言，其根本目的就是征收地租；对国家来说，其目的在于成功征收赋税。这三方显然都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自卷入地租关系的性质，并且经常使三者处于对立状态。当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变化的，有的时候，国家为了赋税收入，会和地主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农民，为提高赋税而提高地租。但是，总的趋势则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国家逐渐加强对地主和佃户之间关系的介入，并与地主处于对立状态，最终彻底消灭地主形成国家与农民的两元格局。

这个过程经历了100年。作者通过这一个世纪的历史过程，将这三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变化，清晰地呈现给读者。作者对这三大主体的论述，以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为社会背景，这是一个中国百年近代史中发生巨大变化的地域。这就

历史理论
领域视野
方法手段
规范学风

史料索引

古今文献
考古文物
简帛文书
回忆追述
社会调查
论著索引

论著评介

通论文集
古代史著
明清史著
近代史著
现代史著

动态信息

期刊集刊
网站网刊
团体机构
学术会议
研究动向

他山之石

世坛综考
美国史坛
西欧史坛
东亚史坛
其他地区

池月山云

文史随笔
知识小品
诗词诗话
文艺点评
小说演义
史眼世心

使得所论述的对象，有了一个充分显示其本质和变化轨迹的空间。

白凯认为，在中华帝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其政治经济体制主要靠向农民征收地租和赋税来维持。这一体制完全仰赖于地主和佃户、国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有序关系得以延续。然而，这种体制在20世纪中叶被摧毁，政治经济结构转而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之上。这种结构的转变，并非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完成的，它是1840—1950这百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商业化之于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是新事物，中国农业经济向商业化的转型早在宋代就开始了。时至清代的中前期，商业化已深入乡村，把地主和农民完全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长江下游流域的商业发展尤为繁盛，这些最终改变了地主、佃户和国家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佃户对地主的反抗大大升级，地主与佃户关系的弱化，国家的财政收入受到威胁，政府加强了对农民与地主之间关系的干预。

1840年以后，外国的入侵使长江下游地区面临着一场危机，严重威胁着精英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地主对佃户交租的压力也有所增大。1853年的太平军不但给这一地区带来战争，而且使政治麻烦与经济困难交织在一起，直接结果就是民众抗租抗税行动的显著升级。虽然太平天国对江南的占领是短暂的，而且各地区不平衡，但是，太平军每占领一处，还是千方百计打上自己的烙印。太平天国对长江下游流域的统治，非但没有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理想进行社会改造，反而通过地方政府体系和土地政策把江南社会折腾得不成样子。

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忠实于清政府的地主接手这一被战争蹂躏的地区，政府及其精英致力于招徕农民重新安定下来开垦土地，并重建传统的权力财产关系。这并非简单的重建，而是以一种改革的精神产生新的关系、制度与实践。在精英和国家为了恢复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而全面进行合作的背景下，其影响得到扩张。并且在地租关系中，产生了政府、地主与佃户之间新的关系模式。越来越多的地主委托租栈和义庄来照管自己的产业，并且争取获得国家对地租征收的更大支持。国家因此加强对农村经济的介入，并且为国家为近代化计划而提高苛捐杂税，使民众反抗的声浪也因此日益高涨。

辛亥革命之后，政治权力分散在地方军阀手中，但是江南地区却基本没有受到军阀统治的蹂躏。1928年，国民党的南京政府确立了对包括江南在内的部分地区的稳固统治。不过，国民党政府的改良主义和现代化计划，使其统治更具备干预主义。在国民党统治下，政府推行土地改革的努力将地主对国家干预的容忍推到了极限。

长江下游地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是被革命行动而是被数个世纪以来结构变迁的累积力量所摧毁。在三方关系的变动中，地主的的日子最不好过。他们占据了地租和赋税的交叉点，最容易遭到两组关系变动的影 响。尤其是1927年之后，地主一方面因为国家提高苛捐杂税而不断受到挤压，另一方面又因为政府和佃户保持低水平地租的要求而压力重重。国民党统治的最后4年(1945—1949)，地主更是每况愈下，税收扶摇直上，佃户广泛欠租，政府努力执行二五减租，地租继续下降。地主的经济困境不过是农村社会权力关系重新调整的征兆。最终摧毁长江下游地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是国家力量的加强与佃户政治力量的成长。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服江南时，地租关系已经濒临崩溃，土地改革只是予以最后一击罢了。

我们过去习惯于阶级分析的方法，将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历史，看作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史，甚至说成是农民起义与地主阶级镇压起义的历史。今天看来，这种两分法的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化。白凯从农民抗租、抗税这一特殊视角出发，以国家政权、地主和佃户这三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要论述对象，对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史进行重新解读，其观点和结论都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为国内学者研究这方面问题提供了新鲜的思路。其观点鲜明，材料详实，分析剖切，堪称力作。

然而，事实的陈述无法超越价值的判断，任何人对历史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保持纯粹的客观态度，这部著作自然不例外。无论是“精英”概念的使用，还是整个著作的字里行间与铺叙论述，都表达出作者对农村经济关系中地主阶级的遭遇、困境和结局的同情。这种取向，与西方学者特有的立场密切相关。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尤其是中产阶级都以社会中坚自诩，甚至认为中产阶级的形成，将是这个社会走向稳定和成熟的标志。正是这样的观点，影响着作者对中国近代社会这100年时间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评价。

[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加入收藏](#)

[Email给朋友](#)

[打印本文](#)

平均得分 9.00, 共 1 人评分

如果你想对该文章评分, 请先[登陆](#), 如果你仍未注册, 请点击[注册链接](#)注册成为本站会员.

